

清前期的中日关系研究

薛 明 著



辽宁大学出版社
Liaoning University Press

责任编辑 薛振威

封面设计 韩 实

封面题字 孙攀河

D829.313

zx6



ISBN 978-7-5610-770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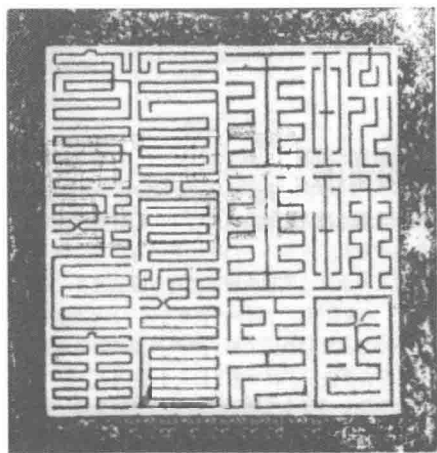


9 787561 077030 >

定价：32.00 元

清前期的中日关系研究

薛 明 著



辽宁大学出版社
Liaon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清前期的中日关系研究/薛明著. --沈阳:

辽宁大学出版社, 2014. 6

ISBN 978-7-5610-7703-0

I. ①清… II. ①薛… III. ①中日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清前期 IV. ①D829. 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25425号

出 版 者: 辽宁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中路66号 邮政编码: 110036)

印 刷 者: 辽宁彩色图文印刷有限公司

发 行 者: 辽宁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幅面尺寸: 148mm×210mm

印 张: 9

字 数: 220千字

出版时间: 2014年6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薛振威

封面设计: 韩 实

责任校对: 齐 悦

书 号: ISBN 978-7-5610-7703-0

定 价: 32.00元

联系电话: 024-86864613

邮购热线: 024-86830665

网址: <http://www.lnupshop.com>

电子邮件: lnupress@vip.163.com

Synopses 内容提要

清代前期中、日之间尽管始终未曾建立最高层面的官方正式往来，但两国政府借由长崎贸易这一民间层面的直接关系，仍然产生了一系列政治外交上的间接关系。在此关系的基础上，再连同两国以朝鲜、琉球为中介产生的各种间接关系，则共同构成了这一时期中日两国政治外交关系的总体形态。

1637年“丙子之役”后，清在议和条款中要求朝鲜引导日本使者赴沈阳朝见，此举最初可能同时包含有将日本纳为朝贡国和同其建立以互通货物为目的的平等往来这样两种内涵截然不同的意图。但通过朝鲜史料中相关记载来分析，清在入关前实际推行的是后一种意图。也就是说，这一时期它对待日本的态度多出自现实的考虑，在对日本的威胁性保持警惕的同时，又希望同对方建立贸易往来以获取所需物资等。另一方面，由于朝鲜坚持采取不合作策略，而清对此亦缺乏一以贯之的强硬态度，从未强令朝鲜执行，最后加之时势的种种变化，该条款最终未能实现。

而在日本一方，亦早就通过朝鲜关注到满族在中国东北崛起的事实。皇太极1627年第一次侵朝战争（丁卯之役）后，负责日本对朝交涉事务的对马藩就曾立即派遣使

节前往探询相关情况。1644年中国“明清鼎革”以后，江户幕府又长期借助“朝鲜—对马藩”这一管道及时获取了中国军事、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各领域的大量情报。相对地，清政权虽早在崇德年间即借由朝鲜的“倭情咨文”得以获取日本情报，但这一管道在它入关以后便很快流于形式。

清在入关后，未曾重演蒙元武力征伐之故事，强令日本前来朝贡。此后直至1871年两国订约建交，清与日本的直接关系只是在长崎一地的民间贸易关系，而日本则始终游离于清的朝贡体系之外。不仅如此，清在平定台湾郑氏势力并解除“海禁”后，为解决其在台官用问题，康熙帝甚至还亲自谋划赴日贸易事宜。康熙中叶以后，来自日本的重要商品——铜更是直接关系到中国货币经济的稳定。康熙朝后期，康熙帝本人对由日本“正德新例”引发的信牌纷争，亦持宽容态度，且在其晚年颁布的新“海禁”令中，独未将日本列入。可以说在近代以前，以康熙帝为代表的清最高统治者未拘泥于朝贡制度来对待日本，而是对后者抱一种相对实用主义的态度，将之视作一个可以获取重要资源的特殊国家。清的这一态度，同其入关之前所形成的对日认识是有一定程度的关联的，甚至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

另一方面，日本虽然最初将清政权视为“鞑靼（蛮夷）”，但随着清在平定“三藩之乱”后统治地位的日益巩固，尤其是“康雍乾盛世”下清代社会出现的长达一百多年的繁荣，使得无论是最高统治者幕府将军，还是普通士

人，对清的认识都发生重大转变，不仅在事实上认可了清政权在中国的正统地位，还极为仰慕同时期清代的中国政治、文化。

日本江戸幕府在面对清初中、琉朝贡关系重建之际，其高层虽一度有所谓“日本之瑕”的强硬表态，但为避免与清发生正面的军事冲突，最终采取了“不治而治”的不干涉立场。而幕府的这一立场，又正符合旨在通过琉球间接获取朝贡贸易利润的萨摩藩的利益。

另一方面，对于在制度和人事上基本承袭明代的清政权而言，不可能对1609年后琉球与日本间的特殊关系一无所知。但与明代中国不同的是，清在此问题上一开始便采取了默认的态度。但历史的吊诡是，在明末一直采取积极主动甚至强势态度的萨摩藩，却在琉球归顺清廷之后，开始变得小心谨慎。此种转变的最大标志，即萨摩藩开始逐步在琉球推行对华隐蔽日、琉关系的政策。此后，清廷历任册封使于琉球逗留期间，在琉球王府的各种应对接待措施背后，实际都有萨摩藩的暗中指挥和操控。

Contents 目录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问题的提出	1
第二节 国内外学界已有的先行研究	5
第三节 本书的研究重点及所主要依据的史料介绍	14

◆ 第一章 入关前后的清与日本关系

第一章 入关前后的清与日本关系	19
第一节 从“降倭”到“漂流民”——与日本人的直接接触	20
第二节 清命朝鲜“但当导其（日本）使者赴朝”（一）	23
第三节 清命朝鲜“但当导其（日本）使者赴朝”（二）	34
第四节 朝鲜向清报告的日本情报——“倭情咨文”	38
附表 崇德年间朝鲜“倭情咨文”一览表	46
第二章 日本江户幕府通过朝鲜搜集中国情报	87
第一节 “朝鲜风说”的成立背景	88
第二节 日本对马藩的情报获取方式	94
第三节 幕府儒官林家与“朝鲜风说”	105
第四节 “朝鲜风说”的情报价值——以中国“三藩之乱” 情报为例	107

第五节 江户幕府末期的“朝鲜风说”	117
-------------------------	-----

◆ 第二编 以琉球为变节点的中日关系

第三章 萨摩藩入侵前后的中、琉、日三国关系	127
第一节 1609 年以前的中、琉、日关系	127
第二节 日本萨摩藩入侵琉球及谋求与中国建立关系	130
第三节 萨摩藩控制琉球对华朝贡贸易及中国的反应	135
第四章 清初中、琉册封关系的再建与日本	146
第一节 明清鼎革乱局下的琉球在华使节	146
第二节 “日本之瑕”——清廷招谕琉球船的日本漂流	150
第三节 “蛮夷者，以不治而治”——江户幕府的最终立场	156
第四节 清政权对琉球首次册封的实现	164
第五章 日本萨摩藩对华隐蔽日、琉关系	167
第一节 萨摩藩的“宝岛”计策	167
第二节 萨、琉联合推行全面对华隐蔽政策	176
第三节 从中国使节著述看萨、琉隐蔽政策之效果	182
第四节 琉球“正史”《中山世谱》的体例与隐蔽政策	186

◆ 第三编 萨摩藩与中日关系

第六章 入关后清的对日态度	193
第一节 海禁下的中日贸易及清的对日态度	193
第二节 福建地方的对日贸易尝试及日本的态度	197
第三节 长崎铜贸易时代中日间的“沉默外交”	204
第七章 江户幕府中期以后日本对清认识的转变	214
第一节 从“华夷变态”到“吴郑论”——儒官林鹗峰 华夷观的幻灭	214

第二节 江户中期以后日本社会的普遍中国认知	219
第八章 长崎贸易中清内务府商人办铜利润的再探讨	229
第一节 日本学者研究中的困惑	229
第二节 1701 年内务府商人奏报的一份办铜明细	233
第三节 内务府商人办铜时期长崎贸易的交易模式	235
第四节 对清内务府商人赴日办铜活动的模拟还原	238
结语	247
主要参考文献	252
后记	276

绪论

第一节 研究问题的提出

若提起清前期的中日关系,^① 首先反应到的想必是这一时期中国东南沿海商人在日本长崎的贸易活动,以及在贸易背景下以中国汉籍输入日本为代表的两国间文化交流。^② 而对于同一时期两国在政治外交领域的关系,由于自1636年(崇德元年)皇太极在沈阳建立“大清”起,至1870年(同治九年)日本明治新政权派遣柳原前光来华与清政府商谈通商立约事宜的近两百五十年间,中、日除在乾隆年间为送还各自“漂流民”事宜,相互有过短暂的地方官员一级咨文往来外,两国政府间并不存在朝贡关系或其他官方层面的直接

① 清前期的中日关系,在日本学界则称为“江户时代的日中关系”。本书中的“清前期”,其大致时间范围是自1636年皇太极改后金为“大清”起至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的两百余年间。

② 有关中日长崎贸易和贸易背景下形成的两国文化交流的研究,由于大部分一手资料(如《华夷变态》、《唐蛮货物账》、《唐通事会所日录》、《舶载书目》等)是由日方记录并保存下来的,因此很自然地亦是由日本学者最早开拓了相关领域的研究。前者经典的研究成果有:【日】矢野仁一:《长崎市史通交贸易编东洋诸国部》,大阪:清文堂1938年版;【日】岩生成一:《近世日支貿易に関する数量的考察》,《史学杂志》1953年62卷11号;【日】佐伯富:《康熙雍正時代の日清貿易》,《东洋史研究》16卷4号;【日】山脇悌二郎:《近世日中貿易史の研究》,东京:吉川弘文馆1960年版;同前:《长崎的唐人贸易》,东京:吉川弘文馆1964年版等。后者则有【日】中村久四郎:《近世支那の日本文化に及ぼしたる勢力影響》(1—8),《史学杂志》25编2、3、4、7、8、10、12号,26编2号;【日】大庭脩:《江戸時代における中国文化受容の研究》,京都:同朋社1984年版等。

接触,^① 江户幕府统治下奉行锁国政策的日本,可以说始终游离于清代中国的东亚朝贡体系之外,^② 因此很容易令人产生没有关系的“错觉”。

实际上,尽管这一时期中、日双方始终未曾建立最高层面的官方正式往来,但两国高层统治者之间借由长崎贸易这一民间层面的直接关系,仍然产生了一系列政治外交上的间接关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是1715年新井白石主导下的日本江户幕府为阻止长崎贸易过程中金银铜的大量外流,颁布所谓“海舶互市新例”(或称“正德新例”),并向当年来航的中国商人发放“信牌”,规定今后无牌商人不准贸易。未能领到“信牌”的部分商人归国后向地方官员提起诉讼,浙江巡抚徐元梦将大致情形奏报康熙帝,并附上暂扣的商人胡云客所领“信牌”原物。后经康熙帝圣裁,认为“信牌”仅为一般贸易凭证,未将其上的日本年号视为严重问题,且准许商人今后持牌继续赴日贸易。此事件最终以中国最高统治者的默许而得以平息。

不仅如此,事实上早在清政权借长崎贸易与日本产生联系之前,尚作为中国一地方政权的它即已通过朝鲜与日本产生了间接关联。

① 有关清前期中日两国送还各自“漂流民”的机制,最近有国内学者在日本学者先行研究基础上作了更为系统且详细的研究。具体参见孟晓旭:《漂流事件与清代中日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另外,在1862至1867年间,日本江户幕府曾四次遣船前往上海调查中国局势并寻求贸易机会,但皆非正式的外交使节。相关具体研究可参见冯天瑜:《“千岁丸”上海行》,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② 在嘉庆朝重修的《大清一统志》一书中,日本虽然和朝鲜、琉球以及越南等国一样,被列为清的“朝贡国”,但却未能载明日本朝贡使节来华进京的“贡道”(实际上亦不存在)。不仅如此,《大清一统志》对于中日两国往来事迹的记载,亦与朝鲜等国不同。汉唐以来中国历代与日本的关系,尤其是关于明末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的记载占据了主要篇幅,而对于“本朝”在嘉庆以前与日本之关系,仅就康熙朝以来的赴日铜贸易以及数件送还日本漂流民事情作了简单记载。由《大清一统志》中对日本的记载可见,对于嘉庆时代的中国士大夫而言,在整理朝贡制度这项内容时,相较于朝鲜、琉球等国,日本已是一个略显特殊的存在。此外,民国初年前清遗老们在编撰《清史稿》时,在该书“邦交志”的日本部分,用超过一万五千字的篇幅详细叙述了1870年以后两国四十年的“邦交”关系,但对于清初至1870年间长达两百余年的两国关系,却仅用了寥寥五六百字,内容主要为中国商人赴长崎贸易的概况,其中有关雍正年间清防范日本借贸易招徕有技艺国人的记载就占去一半以上的篇幅。

1636年末，皇太极发动第二次侵朝战争（“丙子之役”），在战后与朝鲜签订的议和条款中，清明确要求朝鲜须引导日本使节赴沈阳朝见。作为应对之策，朝鲜此后开始不定期向清提交日本情报——“倭情咨文”。而在日本一方，亦早通过朝鲜关注到满族在中国东北崛起的事实。

在上述两种关系之外，中日两国在这一时期还通过琉球这个曾经存在的弱小王国，长期保持着一种极为特殊的间接关系。日本学界普遍认为，这一时期的日本通过要求清的两个重要藩属——朝鲜和琉球不定期向幕府将军派遣贺使的方式，在东亚地区构建起一套与中国朝贡体系交集并存的、可称之为“日本型华夷秩序”的新型国际关系。^①在这种关系中，朝鲜与日本间的“通信使”外交在名义上是平等的，甚至在朝鲜看来，它同日本幕藩体制下具体负责对朝外交的对马藩之间，亦存在一种以朝鲜王朝为主导的“华夷秩序”。^②然而，相较于朝、日关系，琉、日关系则在“琉球——江户幕府”和“琉球——萨摩藩”两个层面，均是琉球处于严重不平等地位的外交关系。尤其是在“琉球——萨摩藩”层面，并非像琉球与江户幕府抑或是琉球与清之间那样，仅为礼仪上的不平等，而存在一种实际上的“操控与被操控”关系。琉球自1609年遭萨摩藩入侵以后，内政、外交上便长期受到萨摩藩的严厉控制，实际上已非完全独立的国家。尤其是在琉球与清的朝贡关系背后，始终有萨摩藩的阴影存在。一方面，萨摩藩是琉球赴华朝贡贸易所需资本的实际提供者和中国货物的主要吸纳者；另一方面，清代历任册封使逗留琉球期间，在琉球王府的应对接待措施背后，都有萨摩藩的暗中

① 有关“日本型华夷秩序”，代表性的论述可参考【日】荒野泰典：《日本型華夷秩序の形成》，朝尾直弘等编：《列島内外の交通と国家》第五章，东京：岩波书店1987年版。由于该体系以幕府将军为中心，故又被称为“大君外交体制”。

② 早在16世纪中叶，统治对马岛的宗氏就从朝鲜王朝那里取得刻有宗氏历代“当主”之名的“图书”（印章）。“图书”虽主要作为贸易上的凭证，但在朝鲜王朝看来，通过“图书”的授受亦使对马成为其“外臣”。这种授受关系在宗氏成为德川幕藩体制下的大名后仍得以保留，也就是说江户幕府在一定程度上默认了对马藩同朝鲜的特殊关系。

指挥和操控。

概括而言,尽管中、日在清前期始终未曾建立最高层面的官方正式往来,但两国政府借由长崎贸易这一民间层面的直接关系,仍然产生了一系列政治外交上的间接关系。在此关系的基础上,再连同两国以朝鲜、琉球为中介产生的各种间接关系,则共同构成了这一时期中日两国政治外交关系的总体形态。而本书,正是以这三方面的间接关系为研究对象,试图从整体上把握这一时期中日间的政治外交关系。

众所周知,早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日本明治新政权就已围绕琉球、朝鲜这两个中国传统藩属国问题先后向清政府发难,此后的甲午战争更是直接起因于朝鲜问题。而持续数百年的中日长崎贸易,更是给近代日本留下诸多重要“遗产”。如这一时期形成的“唐船风说书”,^①成为江户幕府末期的日本及时了解中国发生的两次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等重大事件的重要情报来源之一,直接对其近代的政治、外交走向产生重要影响。而“唐船风说书”的制作者——“唐通事”这一群体,亦曾在日本明治新政府早期对华外交上发挥重要作用,其中较著名的就有郑永宁、郑永昌父子等人。不得不提的还有,以魏源《海国图志》为代表的一批介绍“西学”的中国汉籍,最初亦是由前往长崎贸易的中国商人带入日本,并在之后给后者知识界造成极大的冲击。除上述以外,还有诸多例证无法一一列举。可见,清前期的中、日关系与近代以后的两国关系有着无法割断的牵连,甚至可以说是准确理解近代以后两国诡谲多变的复杂关系的一把关键“钥匙”。亦因此,有必要从整体上对清前期中日关系史尤

^① 所谓“唐船风说书”,是指中国赴日贸易的商人抵达长崎后在日方要求下提供的中国情报。中国商船(唐船)抵达长崎后,日方即派遣翻译(唐通事)向商人询问中国近况。“唐通事”将中国商人提供的情报作成“唐船风说书”后,由长崎奉行(江户幕府派驻长崎的地方最高行政官员)寄送至江户。由幕府儒官林鷲峰父子编纂的《华夷变态》一书收录了自1644年(中国商人传递“明清鼎革”消息)至18世纪20年代前后持续近80年的“唐船风说书”,是目前留存“风说书”数量最多且最具系统性的史料集。

其是政治外交史展开深入的研究。

在此，还需特别加以说明的两点是：一、一般认为，近代以前的中国严格来讲并不存在近代国际法意义上的“外交”（diplomacy）^①；二、本书中所使用的“外交”一词，不仅指清前期中国朝贡体系内的东亚国际关系，更包含了这一时期各国间的一切直接的或间接的往来交涉行为。

第二节 国内外学界已有的先行研究

由于在史料方面占据先天优势，学界对于清前期中日两国政治外交史领域的研究，亦最早是由日本学者开拓的。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起至今，日本学者在这一领域已取得颇为丰硕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学者对这段历史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迄今亦取得相当的成果。接下来，笔者拟对学界的主要研究成果进行大略的梳理和介绍。

一、日本学者方面的研究

浦廉一在《明末清初鲜满关系中日本之地位（二）》一文中，^②主要通过《朝鲜王朝实录》、《承政院日记》、《沈阳状启》等朝鲜史料的记载，对清入关前以朝鲜为中介与日本的间接关系进行考察。对于入关前清关注日本的原因，浦廉一大致指出两点：一、满族在明末日本丰臣秀吉侵朝期间，即已了解到日本的存在，此后更长期借朝鲜渠道获得以兵器为主的日本货物。有史料证明清希望直接同

① 近年来有关“外交（diplomacy）”一词是否适用于描述近代以前中国对外关系的讨论，可参考日本学者夫马进在其所编《中国東アジア外交交流史の研究》一书“前言”和国内学者葛兆光《彼此环绕和交错的历史》一文中的详细论述。【日】夫马进：《中国東アジア外交交流史の研究》，京都：京都大学出版会 2007 年版；葛兆光：《彼此环绕和交错的历史》，《读书》2008 年第 1 期。

② 日本史学研究会主编《史林》，第 19 卷 3 号，1934 年。

日本进行兵器贸易；二、满族在进行对明战争、实现其入主中原的最大战略目标的过程中，有必要对周边势力尤其是日本的动态予以把握。除浦文外，相关重要研究还可参考中村荣孝的《大清帝国与国际秩序的再编成》一文。^①

园田一龟 1939 年出版的《鞑靼漂流记研究》一书，以日本“漂流民”归国后向幕府的供述——《鞑靼漂流记》为主，结合《清实录》、《朝鲜王朝实录》等中、朝史料中的相关记载，较早对 1645 年清廷委托朝鲜将十余名日本越前州“漂流民”间接送还日本的事件进行了研究。^② 园田在书中对日本“漂流民”遇难及获救、随清军入关、在北京的生活、由朝鲜渠道归国，以及归国后江户幕府的处理等事件经过，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另一名日本学者川胜守则在其专著《日本近世与东亚世界》一书的《清日册封关系的摸索——关于鞑靼漂流问题》，^③ 对上述漂流事件进行再探讨，认为清廷为送还漂流民事致朝鲜国王诏书中的措辞，表明了它希望朝鲜能引导日本接受其册封的意图。

岩井茂树的《转送清朝的对马藩主宗义成书契原本与一六三九年前后的东北亚情势》和松浦章的《通报给清的“岛原之乱”消息》两篇论文，^④ 各自对当时朝鲜向清报告的日本情报——“倭情咨文”进行了研究。前者利用新发现的满文档案，将 1639 年朝鲜向清提供的“倭情咨文”所附日本对马藩主汉文书契原文和满文译本进行了比较研究。后者则考察了后来直接导致日本“锁国”的重大事件——“岛原起义”的消息，是如何借助朝鲜渠道向清一侧传播的。

松浦章的《康熙帝与正德新例》一文，综合运用《华夷变态》、

① 《日鲜关系史研究》下卷，东京：吉川弘文馆 1969 年版。

② 《鞑靼漂流记》，东京：平凡社 1991 年版。

③ 东京：吉川弘文馆 2000 年版。

④ 《东亚国际秩序与交流的历史研究》newsletter1，2003 年；《从海外情报看东亚——唐船风说书的世界》，大阪：清文堂 2009 年版。

《康熙起居注》等日、中史料，对由1715年日本“正德新例”引发的“信牌”事件之经过进行了细致考察。他在小结中指出，康熙皇帝在事件处理中之所以能迅速作出合适的判断，其原因当与其在听取1701年秘密赴日的杭州织造乌林达莫尔森带回的情报后，对日本形势已有相当的把握有关。而有关康熙皇帝派遣密使莫尔森赴日的经纬，则可参见松浦章的另一篇论文《关于杭州织造乌林达莫尔森的长崎来航及其职名——康熙时代日清交涉的一个侧面》。^①

岩井茂树在《清代的互市与“沉默外交”》一文中，^② 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1716年浙江巡抚徐元梦为报告“信牌”事宜呈康熙皇帝满文奏折等史料，对“信牌”事件进行再研究。岩井在文中认为，“正德新例”后向中国商人发放“信牌”并非日本原创，江戸幕府应当是在参考康熙皇帝开海后中国海关向出洋贸易商人所发同类凭证的基础上制成的。他还指出，中国地方官员扣留“信牌”后仍令商人无牌前往长崎之举，旨在通过商人之口向日方传达其防止持牌商人形成贸易垄断、维护本国海关税收的意图，并无将关注重点置于“信牌”的日本年号等问题。而对于日本史料所记载的中国商人向日方叙述国内“信牌”纠纷经过时，声称无牌商人向官府告发持牌商人“背叛清朝、追随日本”之事，在清代中国的史料中却找不到此类记载。对此岩井认为，这可能出于中国商人为促使日本放弃“信牌”政策而故意采取的夸大言辞。最后，岩井将长崎贸易中所呈现的中日间的以上交往模式形象地称之为“沉默外交”。他指出，在中、日围绕“信牌”问题的处理过程中，双方虽无任何公文书信或外交使节的往来，但两国统治集团仍然能够得到大量决策所需的对方情报，可以说建立在商业通则上的中日“互市”体系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一体系下，两国不仅实现了货物交换，甚

① 【日】箭内健次编：《锁国日本与国际交流》，东京：吉川弘文馆1988年版；《江戸时代与唐船有关的日中文化交流》，京都：思文阁2007年版。

② 【日】夫马进编：《中国东亚交流史研究》，京都：京都大学出版会2007年版。